

4老板冒充警察抢了煤老板1000万

4个生意落魄的老板、整整5个月的周密策划、多达1000万的现金……连日来,一起罕见的人室抢劫案成为很多临汾市民茶余饭后的焦点话题。

4月25日,临汾市公安局召开立功表彰大会,这起被称为“临汾建市以来的最大入室抢劫案”揭开神秘面纱,记者第一时间赶赴临汾,采访了案件背后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1000万!一分不能少!”

“要不是信息灵通,这案子估计就石沉大海了。”4月28日,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警大队长左永杰说,“案发十几天了,受害人一直没有报案。”2008年4月上旬,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民警在辖区调查走访时获悉一条线索,临汾一煤老板遭抢,“数额大得吓人”。直属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彭亚声迅速派出两个组明察暗访,民警首先约见了“传说中的亿万富豪”王建军(化名)及妻子。

王今年50多岁,在临汾当地开有两座煤矿,尽管身家上亿,但夫妻俩行事低调、朴实依旧,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不约而同、矢口否认,但邻居、小区保安的回答却截然相反,“这早就不是秘密了,都传糊(临汾方言,传遍了)了。”

直属分局刑警二中队负责人曹荣生被安排“再探一次”,“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受害人忽然掩面痛哭。”王建军剧烈反应令曹荣生和同事面面相觑。再说到涉案金额,王似有顾虑,沉默不语。再三询问,这位煤老板脸色凝重,缓缓伸出一个指头。

“十万?”“一百万?”煤老板继续摇头。曹荣生顿了顿,“一千万?”“而且是现金。”煤老板的声音发颤,“我不敢再想,那是一场噩梦。”

案情火速上报,临汾市公安局新任的局长安占功总结了“三个天大”,“如果案情属实,这真是天大的胆子、天大的案子、天大的压力。”临汾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杨通顺被调任一线坐镇指挥,市公安局和直属分局的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侦查工作紧锣密鼓,一一展开。

据王建军回忆,4月10日一大早,三名青年男子敲开他在临汾某小区的家门,“你闯荡社会这么多年,怎么能随便让陌生人进家?”民警禁不住插问,“他们穿着警服,还拿着工作证,我再咋,也不能将警察拒之门外啊!”王委屈地回答。

“警察”登门,王建军夫妇让座倒水,好不热情。其中一名“警察”示意,“有要事详谈”,王建军毫无戒备,将“警察一行”让进屋里,就在关上门的一刹那,一直笑容满面的“警察同志”突然凶相毕露,他们不由分说将王建军五花大绑,一把短把双管猎枪顶住了他的后腰。紧接着,留在客厅的妻子也被歹徒用刀控制,发出阵阵哭喊。这时,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响起,“兄弟们出来混,要钱不要命。”

“要钱好说,你们说个数。”王建军惊魂未定,强作镇静。煤老板的表现反而令歹徒乱了阵脚。负责控制王妻的男子迟疑地看着同伙,竖起了一个指头,这是他们欲先约好的“保底数字”,100万,站在王建军身边的一名持枪歹徒心领

神会,但他狠下心,给煤老板伸出了两个指头。“万一煤老板讨价还价,还能保证一百万。”落网后,他们如实“剖析”了“一变二”的奥妙。此中奥妙却被王建军“误读”了,他“冷静”地与歹徒谈判,“2000万太多,1000万怎么样?”

“1000万,一分不能少!”面对这场“史上最意外”谈判,歹徒强压狂喜,故作豁达,双方成交。

“我压根不指望你们破案”

令专案组心情沉重的是,和受害人接触多了,彼此熟悉了,他竟然吞吞吐吐地请求,“破不了,还是我的麻烦,干脆算了,吧。”他心灰意懒地摆摆手,又补充了一句,“反正,我压根就不指望破案。”

老板何来此言?王建军的妻子悄悄告诉民警,价钱谈妥之后,丈夫获准与外界联系筹款,中午时分,1000万现金全部到位,歹徒命令王建军,所有现金统一送往王在老家的另一处住宅,有人在那里接应。歹徒临走时,只留下一句话,“若敢报案,全家格杀勿论。”

除了杀气腾腾的威胁,最令王建军心悸的,是歹徒对他的熟悉程度。他们不仅了解王建军的司机在其另一处住宅常住,甚至知道这里养着一条“花20万”买来的藏獒。前往该处取钱的途中,歹徒特意打电话吩咐王建军,“把司机调走,把藏獒锁好。”

专案组先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4月10日早7点半,一辆黑色本田轿车与其他进出车辆明显不同,忽快忽慢、走走停停,车上下来的几个人“眉眼更不对”,他们

虽然一身警服,但神色紧张、东张西望,上楼时,有前有后,“故作互不相识”。专案组组长彭亚声立即安排民警调取临汾到王建军老家沿途收费站的录像,果然,这辆“本田”在案发当天再次出现,一查车牌号,“和我们预料的一样,假的。”左永杰说。

王建军夫妇派上了用场。经过一番辨认,两人指着录像里的几名“警察”,连连点头,“就是他们”。

“35岁以上男子……”整个临汾市,接近或符合条件的有几十万人,大海捞针,几十万到几万,几万到几千,再到几百、几十、27人……4月16日,专案组传来喜讯,一名姓曹的吉县男子被锁定,民警连夜前往吉县调查取证,结果大出他们意外,今年37岁的曹某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老板,开有吉县第一家超市,据说开业当年,就盈利100万。家人反映,几天来,他一直在太原。

4月17日凌晨,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局长石有派出“最豪华”阵容前往太原实施抓捕,带队的陈晋民副局长坦言,“成败在此一举,压力巨大。”

“该归案的,全归了”

连续几天的调查摸排,曹某终于浮出水面,民警从天而降,他正在某汽车城,喜滋滋地与刚买的尼桑越野车合影,为他拍照的也是一名吉县人,巧的是,他也刚刚购买了一辆新车。陈晋民立即安排就地突审,没有几个回合,曹某和自己的“摄影师”同乡垂头丧气地承认,正是他们,“和另两个哥们”,策划、制造了轰动临汾的“4·10特大入室抢劫案”。

“我们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划了。”“摄影师”张某说。

现年35岁的张某,在吉县小老板中,也曾占有一席之地,开有一家石料厂,但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为了补窟窿,几个哥们一商议,抢吧,临汾城有的是煤老板。”

王建军是他们几经考察、一致认同的理想人选,“富得流油、活动规律”,为了“打有准备的仗”,他们甚至在王建军所住的小区附近租房半年,每天早出晚归,与王建军形影相随。就在“战斗打响前一天”(张某语),他们再次尾随王进了其小区,考虑到几个大男人的目标太大,遂将事先物色的一名年轻女子呼至小区,展开“贴身”侦查,“务必摸清具体住址”,该女子接令后,故意与王建军在电梯邂逅,并做“一见如故”状,王家到了,女子特意跟出来,与王建军挥手再见。

4月10日清晨,曹某、张某与多年的生意伙伴师某、党某在出租屋会合,简短的“战前动员”后,几人根据女子提供的情报,乘坐张某的本田轿车前往王家。

“事情太顺了,顺得都反常了。”张某说。

1000万现金,足有三四百公斤,“仅蛇皮袋就装了五袋”,四个人高马大的家伙不得不往返数趟,将五袋巨款搬到本田车上,在吉县一个十字路口,几个人开始分赃,“一人250万”。此前,几个人有过经济纠纷,甚至为此闹过别扭,现在当场还钱,长退短补,张某得了300多万,其余人分别获得数百万。

最初几天,他们也曾胆战

心惊,但王建军确实没有报案,几个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将手头的生意贱价处理,不约而同来到太原,“存钱、看房子、买车”,为了彻底摆脱嫌疑,他们甚至将作案用的本田车开到某饭店门口,故意不锁车门,扬长而去。

一切安排妥当,几个人分道扬镳。

4月20日,曹某、张某被押解回临汾,安占功局长亲自前往高速公路口迎接凯旋将士。

据曹某交代,另两名犯罪嫌疑人党某、师某分别在阳泉、四川落脚。4月23日,躲藏在阳泉某矿区一居民楼的党某被蹲守民警擒获。在他的床头柜下,藏着一个大纸箱,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一摞摞现金,民警当场清点,竟有200万。

追捕师某成为当务之急,直属分局刑警中队长周文泉主动请缨,带领数名专案组成员前往四川,不巧,就在前一天,师某与一名年轻女子离开四川,去了海南,抓捕组马不停蹄,急赴海南,正赶上强台风,侦查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渡风浪,终于到达海南,但还是晚了一步,就在半小时前,师某离开海南,去了湖北。

4月25日凌晨,直属分局刑警大队进来一个神情沮丧的男子,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名男子,正是专案组“朝思暮想”的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师某,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师某决定结束逃亡生涯,“是死是活,认了”,一进门,师某声泪俱下,“我错了,我犯了大罪。”

在看守所里,这些曾经跃跃欲试“绑个大款当大款”的犯罪嫌疑人整日以泪洗面、悔不当初。“他们本来有自己的事业,但异想天开,无视法律,最终害人又害己。”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局长石有说。

据《山西晚报》

青帮大亨杜月笙拒赴台定居内幕

大陆解放之后,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远走香港,临老且病之时,即使蒋介石频频召唤,杜就是不愿意去台湾。他为什么不去台湾?这与1949年7月间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一篇严厉批判杜的社论有关。

杜月笙建议封锁沿海各港

1948年11月1日,保密局呈给蒋介石一份密电,直接道出杜月笙采取反制手段,报复国民党当局“经济管制”的幕后原因:沪经济管制之失败,系政府既惩办杜维屏破坏金融案于前,不应放纵孔令侃大量囤积于后,致使杜月笙极度不满,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

上海“经济管制”失败,蒋经国黯然下台。不久,淮海战役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被迫下野,仅能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老家奉化溪口遥控国民党军政首长。

倏忽之间,已到1949年6月间,客居香江的杜月笙,修书一封,寄到台北草山(即后来的阳明山)“总裁办公室”给蒋介石。杜月笙信中告诉蒋介石,他将尽力劝阻沪上企业领袖返回上海。这些企业家个个身怀巨资,他们的动向决定了中国金脉的流向。

杜月笙信上声称,所幸上海港口遭国民党海军封锁,这批人有家归不得,只得暂留香江。杜建议蒋,要让沪上商人断绝了返乡的念头,索性还是“封锁沿海各港”。

蒋介石随即回复杜月笙:“……至建议封锁沿海各港一

节,政府业已决定一律停止开放,先生此次毅然离沪,足征国家民族意识之坚强,佩服奚如。”

蒋三番两次命洪兰友(时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王新衡、潘公展(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等人,络绎于途,不断联系杜月笙。在蒋的心目中,杜月笙当前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拴住旅港的上海企业家,不让他们连人带钱重返上海。

《中央日报》点名狠批杜月笙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洪兰友受蒋介石之命,赴港探望杜月笙之后,报社已迁往台北的《中央日报》,突然在7月18日刊出了一篇以《本党历史的新页》为题的社论,点名直指杜月笙是“买办流氓、土豪劣绅”。

这篇社论,以提出“三点意见”为名目,开宗明义,揭开声色俱厉的批判序幕:“……过去党中若干有力的同志为了避免改造政治社会的麻烦,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丢开主义而各行其是。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它各省市的同志,亦均与土豪劣绅结不解的政治缘。”

社论以空前高调的语气声称:“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但由于一些有力同志的畏难苟安,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别的且不说:上海为什么变成最容易发炎的盲肠?岂不是因为它早成为‘闻人’的天



旧上海“三大亨”: (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下?这闻人也者就是流氓头的代名。那些流氓头是由吾党同志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在它的羽翼丰满之后,就几乎变成了上海的皇帝。我们只要看上海参议会会议长一席竟是闻人杜月笙辞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上海的限价政策之突然受到闻人的逆袭而崩溃,都可以想见那些‘闻人’之已取得上海实际统治权,与夫我们少数同志养虎贻患的不智。”

文章接着说道:“现在我们不能再妥协下去了,也不容再苟安下去了……就是买办、流氓、土豪、劣绅乃至若干军阀的残余势力,也应该加以扫荡……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既是军阀的余孽,也是三民主义前途的障碍,不肃清这些障碍,我们就永远没有方法可以推行,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之政治的措施。”

不可思议的是,社论在字里行间挑明了是要帮一向以“青年导师”自居的蒋经国发声,无形中把写这篇社论者的

底牌泄了光:“本党应将‘戡乱建国’任务的大部分,交给青年去执行……其实,所有能写下去可歌泣历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于领导青年的人……我们希望中枢能划出一部分‘戡乱建国’的工作交给青年,一方面让多数正苦没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面让青年的热忱转化为‘戡乱建国’的行动,务使本党能从此进入更活跃的青年期,然后‘戡乱’的最后胜利才会属于本党。”

底牌泄了光:“本党应将‘戡乱建国’任务的大部分,交给青年去执行……其实,所有能写下去可歌泣历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于领导青年的人……我们希望中枢能划出一部分‘戡乱建国’的工作交给青年,一方面让多数正苦没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面让青年的热忱转化为‘戡乱建国’的行动,务使本党能从此进入更活跃的青年期,然后‘戡乱’的最后胜利才会属于本党。”

底牌泄了光:“本党应将‘戡乱建国’任务的大部分,交给青年去执行……其实,所有能写下去可歌泣历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于领导青年的人……我们希望中枢能划出一部分‘戡乱建国’的工作交给青年,一方面让多数正苦没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面让青年的热忱转化为‘戡乱建国’的行动,务使本党能从此进入更活跃的青年期,然后‘戡乱’的最后胜利才会属于本党。”

底牌泄了光:“本党应将‘戡乱建国’任务的大部分,交给青年去执行……其实,所有能写下去可歌泣历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于领导青年的人……我们希望中枢能划出一部分‘戡乱建国’的工作交给青年,一方面让多数正苦没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面让青年的热忱转化为‘戡乱建国’的行动,务使本党能从此进入更活跃的青年期,然后‘戡乱’的最后胜利才会属于本党。”

蒋介石匆忙宣慰

蒋介石此刻正为国共内战,惶惶不可终日,惊闻《中央日报》隔山打牛,唯恐杜月笙一气之下,撒手不管上海旅港企业家的闲事,立即命洪兰友急赴香港收拾善后。等洪兰友匆匆从广州赶到杜公馆,屋里早已人声鼎沸,骂声不绝。

洪兰友抓紧机会婉言解释,此次完全是《中央日报》报馆里一两个人的胡作非为,绝非党中央的意思,蒋先生已经

交办,严惩撰稿人,此事与蒋公绝无关系,请杜老爷子息怒云云。

杜月笙毕竟不是三尺童子,他哪会轻信底下人捅妻子的说法。一屋子的门生故旧,东一句西一句,群起为杜月笙打抱不平,洪兰友完全插不上话。神色仓皇地走出香港坚尼地十八号杜公馆,洪兰友赶紧给蒋介石发了一通密电,汇报香港的紧急情况。

急令洪兰友赴港安抚杜月笙的同时,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又召来陶希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第四组主任),要他即刻找《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严惩写稿的评论员,并命陶希圣即日赶赴香港,亲自登门道歉。

“总裁办公室”秘书室主任黄少谷,见蒋盛怒不已,知道事情闹大了,赶紧以国民党中央的身份,一连发了两通电报给洪兰友,重托洪全力安抚杜月笙。

洪兰友觉得,杜月笙正在火头上,此时登门表达歉意,不仅“难于为辞”,更是事倍功半。思来想去,忽然灵机一动,与杜月笙同列“上海大亨”的王晓籛,如今也避难香港,江湖兄弟流落异地,急需友人伸出援手,若有人雪中送炭,必能让他感奋莫名。不妨在王晓籛身上下些功夫,说不定可以帮上大忙。洪兰友因致电建议蒋介石,蒋介石深表赞同。

蒋介石当即电令洪兰友,赶紧代表他去探望王晓籛,代表致送慰问金港币一万元。看完王晓籛,再代表蒋去拜访杜月笙、钱新之这班上海青帮首脑,并假借蒋介石有意招商,

到后方兴办工业,欲借重沪上商旅共襄盛举。洪兰友前脚才进杜公馆,蒋介石又交待陈立夫代表国民党前往香港宣慰杜月笙。党政大员穿梭往返,杜公馆贵客盈门,大有昔日十里洋场盛况。

王晓籛接到洪兰友转来蒋介石的一万港元,点滴在心头,赶忙给蒋介石打了一通电报,以表感谢。得知王晓籛电谢蒋先生,洪兰友惊喜雪中送炭之计果然见效,打铁趁热,洪兰友立马要求王晓籛居间协调,人情攻势之下,杜月笙也不好再公开抱怨蒋氏父子,一场风暴俨然已经平息。

杜月笙称病拒绝赴台

1949年9月28日,杜月笙请钱新之带着亲笔信到广州见蒋介石。杜月笙这封信全文约仅五百字,主要说明因苦于气喘病发作,行动不便,故而无法亲自登门拜访。

这封信才送到蒋介石手上不久,蒋马上又命洪兰友、陈立夫,兵分二路,再次分别到香港表达宣慰之意,邀请杜月笙抽空到台湾见面,并再三交待洪兰友、陈立夫二人,务必请托杜月笙力阻旅港沪商返回上海,以免资金流入共方之手。

为了答谢蒋介石的宣慰,1949年10月20日,杜月笙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给蒋介石碰了一个软钉子,自称痼疾仍未痊愈,不便晋谒蒋先生。至于原本滞留香港的上海企业家,已有部分人士重返沪上。

1949年11月2日,蒋又从台湾捎来一信。杜月笙依旧无动于衷,他把这封催驾信函和其他的蒋介石函牍,一同锁进了记忆深处,直到1951年病死于香港。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